

# 一、远古——先秦： 从原始村落中崛起的楚南雄镇

## 湘浏河谷丘原的远古村落

长沙 湖南省的省会 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城市。

长沙市现辖长沙、望城、浏阳、宁乡 4 县(市) 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 西、南、北分别与本省的娄底、株洲、湘潭、益阳、岳阳 5 市(地区) 相邻 东与江西省的铜鼓、宜春、萍乡 3 市(地区) 交界 东西长 233 公里 南北宽 90 公里 面积 11825 平方公里。境内高山挺拔、丘岗起伏 河川纵横、平原舒展 丰姿多采，景色迷人。

这是一个神奇、古老而美丽的地方。

翻开长沙地质史册，早在人类出现以前那更遥远、漫长的时代 这里曾经历过“沧海变桑田”的巨大变迁 经历了亿万年来地质史上多次的地壳运动。

在距今 6 亿年的古生代以前，湖南大部分地区都是一片汪洋大海，长沙还沉睡在一个巨大的海槽之中。到 2 亿年前的中生

代三迭纪，海水从湖南退去，长沙结束了海浸的历史，显露出她的山地、丘岗。又经过几千万年，发生了中生代末的燕山运动，长沙以北的“江南古陆”断陷，形成洞庭盆地，雪峰山和幕阜山被隔离，分峙于东、西两侧，南部的山岭升起，长沙的地质骨架初步形成。直到 300—200 万年前的第三纪末至第四纪的新构造运动，最后形成了与今天大致相仿的长沙地形地貌：东、西两端山地环绕，雄伟峻峭，中部渐趋低平，南部丘岗起伏，向北倾斜，逐渐平坦开阔。全省最大河流湘江由南而北，从中穿过，浏阳河、捞刀河、沔水河、靳江河等 10 多条河流分别自东、西两翼汇入湘江，构成繁密的树枝状水系。河流沿岸形成了诸多狭长的河谷平原。

在现代长沙地貌基本形成的时期，长沙地区的亚热带气候也逐渐形成，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暖。茂密的森林里，虎豹出没，猿猴嬉戏；繁茂的灌丛中，生活着野生的猪、牛、羊、猫、狗、兔……稠密的江河湖沼，有各种各样的鱼类，沿水的河谷平原土质肥沃、疏松，植被丰厚。

温暖的气候、充沛的水源、肥沃的土地，丰富的动物和植物资源，为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类在长沙的历史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

大约在距今 15—20 万年以前，长沙就有了人类的活动，进入旧石器时代。1991 年 8 月，考古工作者在湘江支流捞刀河流域的浏阳市永安镇芦塘村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一批打制石器。这个遗址处于一海拔 65 米的小山丘上，一面连山，三面开阔，距离捞刀河床仅 1000 米左右。出土的石器都是以河床砾石打制而成，较典型的为尖状器和砍砸器。经专家鉴定，这些石器制作于中更新世晚期，相对年代为 15—20 万年前。自浏阳永安塘芦镇旧石器遗址发现之后，几年来，人们又在今天繁华热闹的长沙市区，多次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石器。

长沙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向我们展示出长沙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的生动情景。这时的长沙人过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为了躲避滔滔的洪水和防御猛兽的侵袭，他们结成一个个原始群体，栖息在湘江流域沿河溪两岸的台地和山丘上。他们已学会了制造工具，从河边捡来坚硬的砾石块，经过摔打或锤击，做成一面锋利的尖状器和砍砸器，去采集野果、猎取野兽，从大自然获取食物。长沙的古人类就是以这一极其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渡过了漫长的年代，从而揭开了长沙历史的第一页。

经过 15—20 万年的发展，长沙的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古人类在长沙的活动更为广泛，今长沙市区和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都发现了他们的遗迹。

距今大约 7000 年前的长沙县南坨大塘遗址，是长沙新石器时代的最早代表。这个遗址处于湘江的一段河滩上，附近原有一处台地葫芦山和一片低洼地。1986 年 3 月，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砭、石镰等，分别以燧石、页岩、卵石经过磨制和多次加工而成，类型分明，器型完整。其中，石凿多用长条状卵石将一端磨成刃口。石镰为横一字形，一端磨尖，另一端磨出几道缺口以绑扎镰柄，刃部略有弧度。陶器分泥质陶、夹砂陶两类，有陶釜、碗、罐、盘等炊器、盛食器和盛水器，不少釜的底部还可以见到烟火熏烧的痕迹。

长沙县南坨大塘遗址，其年代与我国著名的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相同；其文化类型与我国江汉平原的大溪遗址文化相似，属于湖南大溪文化。这一遗址的发现，表明在 7000 年前，长沙的古人类已经脱离了原始人群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状态，开始定居下来，炊煮熟食，形成了一个

聚落，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这时，长沙先民已经在使用多种磨制石器，用石斧和石凿锄掘土地，用石镰收割谷物，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他们已有了原始的制陶业。能用泥土烧制出各种形状和用途的器皿，并绘上红色或黑色的图形、图案。我们的先民们就是这样生活在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组织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过着财产公有、相互平等 没有剥削和压迫 但又极其艰苦而贫乏的生活。

大约距今 5000 年前，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屈家岭文化阶段。1988 年 12 月，在捞刀河流域长沙县广福乡梅藪村发掘的腰塘遗址，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这里出土了大批陶器和石器，发现了一座面积 16 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基、状似粟米的农作物颗粒和一些鹿角、兽骨。这时的长沙先民，制作陶器和石器的技术又有了提高，并学会了建造房屋。他们已能烧制鼎、豆、鬶、盘等器形复杂的陶器，磨制扁平小型的石器并在上面钻孔。他们建的房子 房坑深入地面 1 米 呈椭圆形 土坑四壁为墙 屋顶以茅草覆盖。这种房屋 虽然还十分粗糙简陋 但它是我们的长沙先民摆脱穴居野处状态的一个巨大进步。

距今约 4500 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龙山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遗址，在长沙有更多的发现，分布于湘江及其各主要支流流域。浏阳樟树潭遗址、长沙县的月亮山遗址和团里山遗址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这些遗址，面积很大，浏阳樟树潭遗址和长沙县月亮山遗址都位于浏阳河沿岸，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出土的陶器和石器，数量和种类都更多。石器有斧、砾、凿、刀、矛、镞、铲和纺轮等 其中不少形体精细、磨制光滑。陶器有鼎、釜、甗、豆、盘、罐、缸、壶、鬶、簋、瓮、碗和网坠等 器形各异 纹饰多样。月亮山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的玉制装饰件。这些默默无声的遗物、遗存说明 :4500 年前的长沙有了原始的农业，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

要手段，原始制陶业、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已产生原始的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

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是我国原始社会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前后相承的文化形态，而长沙地区从腰塘遗址到樟树潭、月亮山等遗址，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反映，也是父系氏族社会在长沙地区的一系列缩影。生活在湘浏河谷丘岗平原一个个原始村落中的长沙先民，经过极其艰难的跋涉，已经进入了原始社会的后期。

长沙的远古时代，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也留下了很多传说。

据传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他们都曾来过长沙。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为了征服天下，曾‘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地土封给了他的儿子少昊氏。宋朝罗泌的《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明朝崇祯年间的《长沙府志》说：“长沙开疆，原自云阳少昊”。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

炎帝更是与长沙有密切的联系。晋朝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路史》也说“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罗泌之子罗萍注：“炎帝今在麻陂”，并说唐代就有人祭祀。宋代乾德五年（967年）修建炎帝庙。“丁未（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春”，罗萍还亲自来过此地。麻陂为宋代茶陵县地，后划归酃县（今炎陵县）古代属长沙。据传说，炎帝是我国农业的创始者，他教人作耒耜，种五谷，世称神农氏。又说他为民治病，遍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因尝断肠草而逝。炎帝在长沙的传说，正是长沙地区原始社会从采集狩猎经济到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到尧、舜、禹时代，我国南方出现了一个“三苗之国”，即一个

新的氏族部落集团。今天的长沙，即是古三苗国分布与活动的重要地域。《战国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司马迁说：“三苗在江淮、荆州。”<sup>①</sup>唐朝的杜佑更明确地指出：“潭州，古三苗之地。”<sup>②</sup>传说，以尧舜为首的华夏部落曾与三苗发生过长期的战争，多次打败三苗。因此，三苗大部分逃入深山溪峒或向西南山林迁徙，成为后来“荆蛮”、“长沙蛮”和湖南境内以及云贵苗、瑶、侗各民族的祖先。

据传说，舜为了征讨三苗，曾“济沅湘以南征”，过长沙奏韶乐，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即今永州九疑山。他的两位妃子，尧的女儿娥皇与女英，奔赴哭之，陨于湘江，后葬在今岳阳君山。二妃的重义多情，自古传为佳话，被尊称为“湘水之神”。

舜之后，禹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禹继位后曾铸九鼎，划天下为九州。长沙属于荆州。他为征伐三苗和治理洪水，走遍中原大地，并过长江，越洞庭，行至苍梧之野，在衡湘一带留下了“茫茫禹迹”和很多传说。长沙岳麓山顶的禹王碑，那形似蝌蚪的碑文有人推测记载的是大禹“参身洪流……久旅忘家，宿岳麓庭”的事迹。山下的“禹迹溪”又名“拖船坳”，是古传说中“大禹疏凿开山之径”的遗迹。

这种种的传说，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幅洪荒时代的长沙和长沙先民艰难创世的图景。

## 商周扬越之地

公元前 21 世纪，禹的儿子启继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史记》卷 1《五帝本纪》

《通典·州郡十三》

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此之后，直到公元前 770 年 我国北方又先后出现了商和西周两个奴隶制王朝。夏、商和西周，史称“三代”，是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开端、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在这长达 1400 多年的时间里，3 个奴隶制王朝都曾多次兴师南下，渡过汉水、长江，向洞庭湖南北的原始部落发动战争，但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广大地区仍然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

夏朝之时 长沙仍然属于古三苗国。据《国语》记载 夏的军队曾对三苗大张挾伐，彻底打败了三苗部落。三苗祭祀先祖的宗庙被摧毁，庙堂里的礼器被焚烧，大批的三苗人沦为夏朝的奴隶。

到商、周时代，古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的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被称为“扬越”又叫“荆蛮”。因此 史称这时的长沙为“扬越之地”。当时 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生活着一个古老、庞大的民族——越人 即古籍中所谓“百越杂处 各有种姓”。扬越即是古越人的支系，而生活在长沙的越人则是扬越的一支。在漫长的岁月中，古越人创造和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近几十年来，长沙发掘的商周时代遗址如长沙杨家山、宁乡炭河里、浏阳樟树潭上层等处，都发现了具有古越文化风格的遗物：各种与中原地区制作风格迥异的石器、灰色或黑色几何纹饰的印纹硬陶残片等。

商、周时期 北方奴隶主王朝对南方“荆蛮”、“扬越”的战争更为频繁。

据古史记载 商朝初期 商的军队曾大举南下 侵伐“荆蛮”。当时“汉南之国”即汉水以南的各部落听说商王汤很有德行 纷纷表示归顺。至商中期 商王武丁再次征讨“荆蛮”。《诗经·商

颂·殷武》“挾彼殷武 奮伐荆楚 深入其阻 哀荆之旅”的诗句即描绘了这场战争 商王的军队奋扬威武 讨伐“荆蛮”深入到险阻之内 打败了“荆蛮”俘获了大批人口。

西周对“荆蛮”“扬越”的战争多是在西周中期以后进行的。据《竹书纪年》记载 周昭王曾 3 次南征 但都遭到“荆蛮”的强烈反抗 最后“南巡不返”“卒于江上”。传说周昭王“南巡”时已到了长沙，今长沙与湘潭之间临湘江而立的“昭山”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山下有深潭名“昭潭”即昭王葬身之所。周昭王以后 周穆王、周宣王又继续用兵“扬越之地”。《竹书纪年》说：“周穆王伐大越 起九师”；《诗经·小雅·采芣》云 周宣王命元老方叔率师伐荆蛮“其车三千”。可见其声威之大。

商周王朝对“扬越”的战争，虽然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 但也使“扬越之地”一度成为商周的“南服”迫使“荆蛮”服威纳贡。《逸周书·王会》载 周初营建雒邑告成 各方诸侯来贺 贡献方物 其中有“长沙鳖”一种。长沙江湖交汇 出产的鳖鱼肉鲜味美 已成了朝见天子的贡品 这也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来自中原的奴隶主王朝还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曾使用过的种种器物。近 50 年来，长沙地区出土和发现了大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 其数量之多 制作之精美 不仅为湖南全省之冠 即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其中，如宁乡县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卣、兽面纹分裆鼎 浏阳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卣，长沙县出土的甬钟、鸛卣 望城县出土的兽面纹甗等等，其器形、纹饰、铭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相似 有的甚至完全一样。卣、鼎、甬、甗是古代王室和贵族祭祀的礼乐器。商周人迷信鬼神 注重礼制 好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祖先和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即使征伐在外也依时举行。每逢祭典 这些以青铜制作的鼎、甬、甗便满盛佳肴 尊、卣斟上

美酒，钟鼓齐鸣，烟火缭绕，甚是庄严肃穆。这一部分青铜器，很可能就是商周王朝的军队和贵族随带而来的。

商周王朝中原文化的不断传入，促进了长沙的开发。当时，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制公社的生活，还是以石器作为主要的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式的生产。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长沙，长沙越人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西周后期才有了铜制的耨和耨。耨即大耨是一种重要的松土工具。耨即耨用于松土和起土。青铜斧、耨和耨，在宁乡、浏阳和邻近长沙的湘潭、茶陵、岳阳都曾出土。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出现，表明此时长沙地区已从原始的耨耕农业阶段发展到耨耕农业阶段。湘浏河谷丘原上的肥沃土地正在被一片片地开发出来。

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商周时代的长沙，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处于原始状态中的长沙越人，学会了青铜铸造技术，不仅能制造青铜工具，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乐器。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沙出土的大批商周青铜器，大多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越族风格。充分显示了长沙商周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1938年宁乡出土的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纹饰精细，是商周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1959年以来宁乡和长沙县出土的十几件铜铙均以怪兽、虎、象、牛等为主纹装饰，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为我国最大的商代铜铙。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青铜器形体高大厚重、纹饰优雅且多以动物造型，与中原青铜器的庄严凝重和图案化倾向相比，更显得形象生动、秀丽精巧。“扬越之地”长沙，在我国青铜时代也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南重镇

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奴隶社会崩溃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代。新旧交替，风云激荡，长沙地区的历史也随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春秋晚期，楚国的势力进入长沙，把长沙纳入她的统治之下。从此，楚人代替了越人，成为长沙居民的主体；“扬越之地”长沙成了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这片长期以来处于原始状态中的土地也从此跨过奴隶制时代，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

楚，又称荆楚，传说是祝融氏的后裔发展起来的部族。西周初年，周成王以楚始祖鬻熊曾有功於周，封其曾孙熊绎于江汉之地，始建楚国。熊绎率领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到熊渠时，即“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逐渐富强起来。春秋初期，楚国势力迅速壮大，进而北伐中原，东征江淮，版图不断扩大。

这时，楚国的视野又射向江汉以南，开始了对湖南的扩张。春秋初，楚国的势力分东、西两路南侵。西路从都城郢（今湖北江陵）一带越过长江，进入洞庭湖西部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东部自鄂地出发，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南进。<sup>①</sup>到春秋中期，楚国在湖南的扩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西路，征服了“百濮”的反抗，兵锋所指，已达湘西的丛山峻岭之中，后来又在此设立黔中郡作为它在湘西北的统治中心，随后转而东向，进入资水流域，推进到今益阳、宁乡等地。在东路，则已进入洞庭湖以南的

参见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96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

河港水网地带，并将它在江北、中原地区所灭掉的罗子国和麇子国的遗民迁到今汨罗、岳阳一带，建立起了重要的军事据点。楚国南下之师几乎是锐不可挡，其前锋已从东、西两个方向逼近了长沙。大约在春秋晚期，楚国的势力进入长沙地区，把这里纳入到它的统治之下。“成王恽元年……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sup>①</sup>这即是春秋时期楚国在大江重湖之南开疆辟土、胜利进军的宝贵记载。

长沙，地处湘江下游，腹地平衍，北临洞庭，为荆郢之唇齿；南界五岭，控湖湘之上游，西接黔中，东交瓯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楚人入据长沙以后，在这里屯聚粮草，驻扎军队，随即又由此沿江而上，深入湘南。长沙成为楚国往南拓展的重要据点。

战国初，地处江浙的越国灭亡吴国，又起而与楚国争夺在东南地区的霸主地位，楚越对峙开始。长沙又成为楚国东南边陲的要塞。越王无疆时，齐国派使者前往劝他西征楚国，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sup>②</sup>这里的“庞”即今衡阳，处长沙之南；“无假关”在今岳阳与湘阴之间，为长沙之北，两地至汉代时仍属长沙。可见长沙其时不仅是楚国的粮仓，而且在军事上也极为重要，是楚越之争的要地。

战国中期，楚悼王任用著名的政治家吴起为相，实行变法。楚国力更为强盛，对南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席卷沅湘”；“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把湖南全境都纳入了楚的政治版图。至楚怀王时，发展为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泱泱大国。长沙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

《史记》卷 40《楚世家》

《史记》卷 39《越王勾践世家》

重镇，从洞庭到南岭包括湘北、湘中、湘南广阔地域的政治军事中心。这时，楚国已在长沙建立了城邑，在城外依山临水之处修筑了戍城、戍所，并有文臣武将驻节于此，以守卫重镇长沙。1951—1957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子弹库、浏城桥等处发掘了一批大中型战国时期楚墓。其葬具分别为二棺二槨或二棺一槨，随葬礼器中的列鼎是 5 件一套。据“周礼”这都是属于大夫一级的规格，可知这些墓的主人都是职位仅次于卿的大夫级官员。其中浏城桥 1 号墓并随葬有兵器 93 件，表明这位身为大夫的墓主人又是一位统兵作战的将军。据地方志记载，楚怀王时的上官大夫靳尚曾封于宁乡，传说今宁乡之靳江就是因此而得名。他死后即葬在今宁乡麻山乡罗田村，墓旁有田名“上官丘”，靳江在墓前流过，至今墓址尚在。

作为军事大国楚国，素有兵器锋利“惨如蜂虿”之称，连强秦的国君也为之心怖，叹曰“吾闻楚之铁剑利”。骁勇善战的楚人也为我们地下保留了大量更直观、更生动的证物。近 50 年来，长沙地区发掘清理楚墓 3000 多座，出土了大量楚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用于攻伐征战的兵器。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仅剑一类，就有铜剑 500 多柄、铁剑和钢剑 31 柄。有的墓葬，戈、剑、矛成套出现，甚至同一墓葬竟出土有完整的 2 套。种类也十分齐全，有剑、戈、矛、戟、铤、镞、弩、盾、弓、矢等，包括了步战、车战、近战、远射、攻击、防卫所需的各种兵器，也包括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事武器。杨家山春秋晚期墓出土的一柄钢剑，长 38.4 厘米、宽 2—6 厘米，系以中碳钢制成并经反复锻打和高温退火，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把钢剑。浏城桥 1 号墓出土的长达 3.1 米的木柄铜戟、2.8 米的藤柄铜矛等长兵器，坚锐轻便，颇为少见。扫把塘楚墓出土的弩机，全长 51.8 厘米，各种构件保存完好，系利用杠杆原理制成，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

把全弩。

楚人的进入，使长沙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数百年的战争，长沙古越人消失了，楚人成为长沙居民的主体；朴实淳厚的古越文化也为色彩斑斓的楚文化所替代。楚人的南来，又传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促进了长沙的开发。这时的楚国已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化，其社会制度也随着它的武力征伐移植到新开辟的疆土，长沙从而也结束了自商周以来又延续了 1000 多年的原始状态，而直接跨入了封建社会。

到楚怀王时 楚国由于政治腐败 外交失策 国势日弱 各诸侯国特别是强大的秦国乘机对楚国发起了接二连三战争。前 278 年，秦国大将白起攻陷楚都郢，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国都沦亡 山河破碎 使楚国朝野上下为之震惊 为之哀恸。这时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流放湖南 正在长沙 闻此噩耗 悲愤不已 感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写下著名的诗篇《渔父》、《怀沙》：“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遂于这年的五月初五日，自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悲愤殉国，极大地震动了湖湘人民，长沙楚民无不悲痛奔号。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他大量不朽的诗篇，从此在湖湘间流传下来，成为激励人们为救国救民而艰难求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力量。

在屈原自沉汨江之时，秦楚战争还在猛烈地进行。前 277 年 秦国分两路进军 大举击楚，一路以蜀守张若带领 自四川顺江而下 攻占巫郡；一路由白起统率 从郢城南下，占领黔中郡。随后 两路挥戈东进 直逼湘江流域。据《韩非子·初见秦篇》载：“秦与荆人战 大破荆 袭郢 取洞庭五湖江南。”这里的“江南”即指长江、洞庭湖以南至南岭的广大地区。楚国的江南重镇长

沙，很可能也在这次战争中被秦军所夺取了。

然而，秦军却突然中止了它的进攻。前 276 年 楚顷襄王收集东部兵力 10 余万 乘机反攻“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 距秦”收复了大片失地。“江旁”即指“江南”其“十五邑”自当也包括长沙在内。<sup>①</sup>从此，长沙又成为楚国西南边陲重镇，大批楚国的贵族、官员流亡而来，与本地军民一道，在这里坚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抗秦斗争。

前 230 年 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几年中即灭亡中原韩、魏等国 接着举兵伐楚。楚王惊怖之余，答应“献青阳以西”的土地，以阻缓秦军凌厉的进攻。但长沙军民没有停止抵抗，并一度发兵北上，袭击秦国的南郡。于是，秦国最后灭楚的战争在江东展开。前 224 年 秦王以老将王翦统带 60 万大军攻打楚国，杀楚将项燕，大败楚军。次年 攻拔楚都 俘虏楚王负刍。前 222 年 王翦统兵南下 打败楚军在江南的余部。至此，以长沙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江南之地被秦国所征服 建国 800 多年，一度中分天下、统一中国南部的楚国宣告灭亡。

参见郭仁成：《楚国经济史稿》，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 二、从秦代长沙郡到三国古战场

### 秦代长沙郡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如风卷残云，迅猛激烈，至公元前 221 年最后灭齐，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

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诸侯，立郡县，分天下为 36 郡。在原楚国的“江南”之地，正式设立长沙郡。据《汉书·地理志》载：“长沙国，秦郡。”南朝酈道元《水经注》亦云：“秦灭楚，立长沙郡。”从此，长沙开始纳入全国统一的政治体制，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行政区域载入史册。

秦代的长沙郡，以今长沙地区为中心，北起洞庭，南逾五岭，东邻鄱阳湖西岸和罗霄山脉，西接沅水流域。据明朝崇祯年间编《长沙府志》沿革所述，秦代长沙郡下设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耒、桂阳等 9 县。这是古代长沙最早的一批县级行政区域，其范围包括了今岳阳、长沙、湘潭、株洲、益阳、衡阳、邵阳、娄底、郴州、零陵等 10 个地市，以及鄂南、赣西北和广东的连县、广西

的全州等地，面积几乎相当于今天整个的湖南省。其中湘县即今长沙、望城、宁乡、浏阳 4 县(市)地，故城在今长沙市区之内，为长沙郡治所，是郡的最高军政长官的驻节之处，也就是辖境广阔的长沙郡的政治军事中心。

由于年代久远，又因秦朝命运短促，二世即亡，有关秦朝长沙郡的历史大多已湮没无闻了。今天我们只能根据秦朝统一的郡县制度，为之描绘出一个粗淡的轮廓。秦代的长沙郡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其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并设有郡尉管军事，监御史掌监察。郡下各县，行政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又设有县尉掌军事和治安，县丞掌司法和税务。县以下设乡、亭、里等社会基层行政单位，有三老、亭长、里正等职，以禀承郡县的命令实施对社会的统治。可见，秦代的长沙郡已有了一整套上承中央，下至县，以至社会基层的层层相辖的军政设施。在此后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沙的地方行政系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衍变和发展起来的。

长沙郡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也比战国时期更为重要。它北有洞庭重湖，南有五岭屏障，发源于岭南的湘江流贯全境，连通南北，交会东西，为秦帝国南部疆域的重镇名城。浩淼无涯的洞庭湖，阻隔关山，是长沙的北部门户。据清朝光绪年间所修《湘阴县图志》载“洞庭湖中有磊石山、秦骑望两处，高踞全湖，周望万顷，铜盆、万石两汉，为湖中栖泊要害，南北有事，势在必争。”据有关专家考证，此“秦骑望”很可能就是秦朝驻兵守望的前哨阵地。“千古第一帝”秦始皇巡行天下，即曾亲临洞庭。前 219 年，他从南郡“渡江至湘山祠”。湘山即今岳阳君山，处于烟波浩荡的洞庭湖中，山上葱笼青翠，祭祀湘君的湘山祠临湖而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渡湖登山，湖面大风骤起，波浪滔天，“几不得渡”。便问随行的博士：“湘君何神？”博士答“听说是

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葬于此。威震四海的秦始皇似乎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勃然大怒，乃下令派刑徒 3000 人将湘山的树木砍伐殆尽，然后返驾回都，未能继续南行。

长沙郡南境，五岭逶迤，形势险峻。岭南为越人聚居的南越，包括了今广东、广西在内的辽阔地域。秦始皇晚年，令尉屠睢率 50 万大军伐越人、戍五岭，发动征服南越的战争。长沙郡是其重要的军事基地。当时，秦朝在郡内修筑了通往越地的“新道”，作为秦军的进兵与粮运之道。古籍记载，其时长沙郡的零陵县和郴县都修有“驰道”，至今犹有遗迹可寻。据《淮南子·人间训》记，屠睢统率的 50 万人马分为 5 军，分戍 5 处，其中“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都是在长沙郡的零陵县境内。这两支军队很可能就是经长沙郡境，溯湘江而上，再由新道逾岭而南的。秦征伐南越的战争，规模巨大，甚为激烈。秦军曾“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秦始皇乃命监史禄在零陵县境南端（今广西兴安县境）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之间开凿灵渠，使大批人马粮草由湘江船运，经灵渠入漓水，源源不断开入南越，为秦帝国的开疆辟土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封建王朝，但由于秦统治者的滥用民力、残暴无度，很快就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灰飞烟灭。秦代长沙郡的历史随之结束，新的时代也从此开始了。

## 西汉长沙国的封立

秦朝灭亡以后，又经过 4 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五年）汉王刘邦最后打败西楚霸王项羽，正式登基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